



文献论 载体论 目录论

版本论 校勘论 辨伪论

辑佚论 编纂论 专题论

Gudian Wenxian Quo

古 典 文 献 学

陈广忠
军著
程水龙

徐志林

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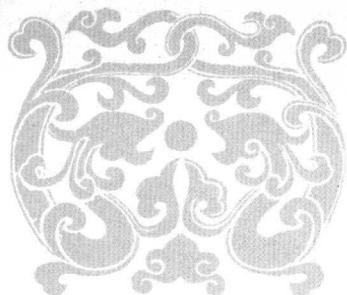
黄山书社

古 典 文 獻 學

學

陈广忠 程水龙
徐志林 王军 著

Gudian Wenxian Xue



辨佚论

辨真论

辨伪论

辨助论

辨疑论

辨伪论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献学 / 陈广忠等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06.8

ISBN 7-80707-387-X

I . 古 ... II . 陈 ... III . 古文献学 IV .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577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安徽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80 千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定价: 32 元

自序

“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对‘走进’中华文明领域发生莫大兴趣”。^①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世界上正在涌动着一种新的潮流，这就是“中国热”。风水轮流转。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受尽西方文化摧残的东方文明，再一次焕发了青春。这是从大唐盛世以来，地球上的各色人等，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既可以治国平天下，又可以修身齐家。而寻其根底，就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编撰这部《古典文献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给有志于探求中国文献宝藏的研究者，充当一个进入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殿堂的引导。

战国道家旗手庄子有这样的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人生是短暂的，而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以如此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穷究中国 10 万种文献，那无疑是以管窥天。因此，本书的作者，不揣浅陋，发一孔之见，而成此篇；其中立论、材料、行文的讹误，则是不可避免的。“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儒家亚圣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这部奉献给世人的作品，能够对读者有“二三策”的启迪，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① 新加坡《联合早报》，谭中《到不了彼岸的‘去中国化’》，《参考消息》，2005 年 6 月 14 日。

学术贵在创新。五千年来的历代学术创新者，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自然天道观，儒家鼻祖孔子的仁学思想，战神孙子的兵书战策，浸透爱国情结的屈原《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史记》……这些具有独到的思想体系、独立的思维模式、独特的文章架构，成就一家之言，而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本书力求创新，不愿拾人牙慧。然而从 20 世纪 30 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兄弟编出《中国文献学概要》以来，经过众多学者七十余年的孜孜求索，对“文献学”范畴的认识，已无根本的分歧，想要标新立异，难于上青天。尽管如此，本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尽力反映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比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认为《楚辞》定名于西汉刘向，本书认为在刘向之前的 120 年，《楚辞》之名已经成立；对清代文献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关于“篇卷”的阐述，表示了异议；对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列为“精校精注本”的杨伯峻《列子集释》、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文献学辞典》中关于“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的解释，对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版本编》中关于“善本”的定义，表明了作者的意见，等等。当然，这些诸多的观点，不过是班门弄斧。但至少说明，著者不是随波逐流者。

学术重在经世致用。清代文献学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反对崇尚空谈的陋习。这一思想，实则是中国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悠久传统。从老祖宗孔夫子整理六经开始，刘向、刘歆典校群书，就遵循学问有益于社会的准则。只有为社会所接受，方能世代相传。权势与金钱学术，只能是过眼烟云。打开 7 部正史《艺文》、《经籍》之“志”，以“六艺”为中心的历代经学研究，无疑是中国古代文献的主流，但是也成为封建权贵、文人获取名利、地位、官爵、财富的敲门砖；真正有价值、为世所用的能有几部？连篇累牍的废话、空话、大话、假话，岂能流传千古？本书向往“致用”。作为高校教材项目，首先要为教学服务。从教学方面来说，必

须符合科学性、知识性、系统性的要求；作为研究项目，则要建立理论体系，设计篇章结构，探索内部规律，体现九“论”之意旨。而倡扬皖派朴学之风，抛弃空疏之论，则是本书遵循的准则。

文章不怕千次磨。许慎著《说文》、扬雄编《方言》、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李时珍修《本草纲目》等，二三十年磨一剑，其书乃终生智慧之结晶，成不朽之大业。尽管如此，其书仍漏洞迭出。本书之编写，虽师生协力，历经五载，数易其稿，然而“磨”的功夫相差甚远。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急功近利，杀鸡取蛋，如果几十年才能拿出一样东西，只能喝西北风。因此粗制滥造、抄袭拼凑的垃圾文章，比比皆是。此非学者之责，乃世风之过也。丑媳妇不怕见公婆。这部著作终究要面对读者，就让社会来品头论足罢！——这也正是作者所祈盼的。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个颇讲“风骨”的人。《郑板桥全集·家书叙》中有这样的妙文：“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故自为序。

陈广忠

2005年6月序于安徽大学草野居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文献论	
第一节 文献概述	(1)
第二节 文献的来源	(7)
第三节 文献的架构	(21)
第二章 载体论	
第一节 甲骨	(44)
第二节 吉金	(52)
第三节 刻石	(59)
第四节 简牍	(65)
第五节 缂帛	(77)
第六节 纸张	(81)
第三章 目录论	
第一节 目录概论	(95)
第二节 解题目录	(106)
第三节 史志目录	(110)
第四节 私家目录	(117)
第五节 其他目录	(126)
第四章 版本论	
第一节 版本概述	(131)
第二节 版本鉴定	(157)
第三节 善本	(170)

第五章 校勘论

第一节	校勘概说	(181)
第二节	校勘方法	(194)
第三节	校勘结果的处理	(205)
第四节	官私校书与校勘学要籍	(209)

第六章 辨伪论

第一节	伪书概说	(221)
第二节	古书辨伪	(227)

第七章 辑佚论

第一节	辑佚概说	(246)
第二节	辑佚的前提:亡佚	(253)
第三节	辑佚研究与成果	(255)

第八章 编纂论

第一节	编纂概说	(264)
第二节	古代丛书	(273)
第三节	古代类书	(290)
第四节	古代政书	(301)
第五节	总集、别集与文论	(309)
第六节	“十三经”汇刊	(331)
第七节	子书合编	(343)
第八节	“二十五史”及其它	(345)

第九章 专题论

第一节	小学类文献	(360)
第二节	儒、释、道文献	(392)
第三节	科技类文献	(416)
第四节	艺术类文献	(441)
第五节	地理类文献	(464)
第六节	法律及军事文献	(470)

第一章 文献论

第一节 文献概述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古老文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宁夏中卫大麦地有 3172 组 8453 个岩画个体图形，其中有一千五百多个图画文字。在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就出现了 27 种刻划符号。而早于半坡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则发现七十多种刻划的彩绘符号。这应是汉字起源阶段的文字。在距今四千至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四种比较复杂、造形抽象的符号。有的与商周甲骨文十分相近。可以说，这些陶器都与汉字起源密切相关。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的甲骨文时期，汉字已经完全成熟。这样，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便产生了。

一 文献释义

论及“文献”，就不能不提到《文献》杂志社于 80 年代中期组织的“关于文献和文献学问题的讨论”。那场讨论以“文献”一词为核心，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义与今义等方面的问题，从文字、训

诂、语法、文化、历史以及相关学科的角度，进行阐释分析，以期达到“正名”的目的。然而众说不一，那场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能达成共识的界说。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中记载：“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知孔子所得为《夏小正》及三《易》之一的《归藏》，为夏、殷二代文书典册，但不是“礼”。今天通行的“文献”一词，与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孔子使用的“文献”相比，其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古代，“文献”作为一个合成词，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是指典籍，即国家法典、典策和书籍的统称。《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从犬，虍声。”依许慎之说，此字可分为两义：其一，古代作为宗庙祭祀用犬的专称。其二，有进献义。这都与“文献”之“献”义无关。这里的“献”，指的是贤人，当是“獻”的假借义。引申指见识广、读书多并且熟悉掌故的人。孔子所说的“文献”，东汉学者的理解还是如此。如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杞、宋）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氏用“文章”训释“文”，以“贤才”解释“献”。其实，在古代典籍里，训“献”为“贤”，绝不仅此一例。《谥法》云：“聪明睿智曰献。”又《尚书·皋陶谟》：“万邦黎献。”伪孔《传》：“献，贤也。”又《尚书·酒诰》：“汝勤毖殷献臣”，“越献臣，百宗工。”句中的“献”字，传疏皆训“贤”之意。

郑玄“文献”之训，被后学所继承。《汉志》唐颜师古注：“征，成也。献，贤也。”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清人

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人刘师培《文献解》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仪之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人也。”^①《广雅·释诂》：“仪，贤也。”刘师培以为“仪”、“献”通假，“仪”有“威仪”之意，即礼也。那么“献”不足，即“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与刘宝楠训“献”为“秉礼之贤士大夫”，其义相似。

“献”在保藏、传播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他们的口耳相传，才使许多重要典籍得以产生，并流布开来。这在中国、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中都是如此。《尚书·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洪范》是一篇讨论治国的重要文献。《洪范》即大法。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消灭商纣王，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周武王“访”“献”，箕子就把自己“闻”的故事及《洪范》，介绍给武王。史官记录下来，便成为这篇著名文献。《诗·小雅·皇皇者华》，其小序云：“《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派遣的“使臣”，即访“献”之臣。其活动有：“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左传·襄公四年》：“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国君派使君访问贤人，求取善道。可知古代“文”“献”是各有专指，“文”是典籍，“献”是贤人，合而用之，是将“书”和“人”结合在一起。到了后代，文字承载信息越来越大，书籍的作用便日益凸现出来，而作为“献”人的作用，便降为次要的了。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里曾将“文献”两字解释为相互关联的概念，即是“信而有证”的两类史料：“凡叙事则本之经

^① 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三年宁武南氏校印。

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在这里，“文献”的含义已逐渐接近现代“文献”应有的外延，虽说“献”仍与“臣僚”、“诸儒”、“名流”、“稗官”有很大关系，但已是其“评论”“记录”“奏疏”之类文字史料了。尽管他这里是用“文献”作为书名，但和现代意义上的“文献”还是有差别的。他是指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比古代“文献”要广泛得多。

据《文献学导论》的作者考证，马端临不是最早使用“文献”作为书名的。金代耶律履，曾为参知政事，谥“文献”，并有《文献公集》15卷行世。其子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去世10年后，马端临才出生。因此《文献公集》是最早使用“文献”作书名的。本书认为，《文献公集》出版时间不明，尚无法确定两书时代的先后。

二 文献与文献学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世界所罕见。据初步估计，现存古籍总数在十万种以上。文献典籍记录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历史发展到今天，学者们也都力图给“文献”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定义，让它既能包括历史的文献又能涵盖现代的文献。

《辞源》：“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辞海》（缩印本珍藏本）：“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今为记录有关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之文献

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现代对“文献”定义内涵的规定，含有四个要素：①一切载体。②文字、图像、音频等记载手段。③知识信息。④记录。那么，广义的“文献”，是指将人类全部的知识信息，用文字、符号、音像等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它不仅包括过去的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还包括现在以及将来可能会产生的“文献”资料。狭义的“文献”，是专指所有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不仅包括一切图书资料，还包括部分承载知识信息文物资料。在我国，狭义“文献”即是古典文献。这样，就把两个内容排除在“文献”范围之外：其一，即“献”者。指掌握一定知识信息的人。其二，“文物”中没有符号记录的物质，如金石器皿之类。《辞源》中包括“图书文物”，其定义尚需推敲。

“文献学”这个专有名词，大约产生在近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①此书完成于1920年。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认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②梁启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其一，“文献学”的说法已经成立。其二，“文献学”的概念可能在梁氏之前就有人使用了。其三，彼时的“文献学”，仅仅是指史学或史学文献。而把“文献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的，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书中把“文献学”解释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本书涉及到文献研究中的目录、版本、编纂、校勘中的诸多问题，初步建立了文献学的范畴和体系。张舜徽《中国文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18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105—106页。

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中认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为文献学的别名。”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文献学包括“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讎”。两书的观点,反映了传统上对文献学内容的理解。此后,有关文献学的通论和专论性质的著作便不断涌现。文献学是研究文献和文献产生、发展的历史,文献的性质、特点、种类、鉴别、功能、流传、整理及利用的科学。简而言之,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版本、目录、校讎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以部分代替全体。

文献既然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那么文献学也就有普通文献学和专门文献学之分了。普通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一般而言,有研究文献的特征和功能的;有研究文献和文献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有研究文献的类型的;有研究文献的交流与传播的;有研究文献的资源共享的;还有研究某个特定的文献群或专门学科的文献等。如果给文献学作一个初步分类的话,可以这样来分:

- 从流传上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
- 从内容上分:普通文献学、专业文献学。
- 从时代上分:古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
- 从学科上分:社会科学文献、自然科学文献。
- 从使用上分:文献理论、文献应用。
- 从民族上分:汉民族文献、少数民族文献。
- 从国别上分:中国文献、域外文献。

这样划分的目的,仅仅说明文献学是一个集综合性、专业性、边缘性相结合的学科,涉及的领域之广阔,与诸学科联系之密切,发展进步之迅速,是众多学科无法企及的。这也说明,文献学作为一个基础和专业并重的学科,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发展进步,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本书所讨论的文献学，偏重于传统意义上的即狭义的古典文献学，它主要是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既考虑到普通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又涉及到专门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其内容包括文献的分类、整理、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鉴别、翻译、检索、文献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等。

第二节 文献的来源

文献作为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就其来源进行考察，可以分为著作、撰述、抄纂和翻译四类。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说：“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他所说“三大类”，就是“著作”、“编述”、“抄纂”。洪湛侯在其《中国文献学新编》中亦承其说，认为文献内容体裁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类。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列“翻译”一章。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总其成，分为“著”、“述”、“编”、“译”四种。各家观点已经趋于一致。

一 著作

文献学中的“著”、“作”，是指具有独到的观点、独创的体系、独立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文献作品。它是作者的智慧成果，任何同类型的著作都是无法取代的。也就是说，它具有两个特点：①排它性。②独创性。比如：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孟子》、《荀子》，《易》学中的《周易》和《太玄》，兵家中的《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法家中的《韩非子》和《商君书》，文学中的《离骚》和《七发》，史学中的《国语》和《史记》，音韵学中的《切韵》和《韵镜》，文字学中的《说文》和原本《玉篇》，小说中的《红楼梦》和《西游

记》，训诂学中的《方言》和《释名》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著作”，都具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特点。

“作”的本义是产生、兴起的意思。《说文》：“作，起也。”引申为创作义。如《书·益稷》：“帝庸作歌曰：‘敷天之命，惟时惟几。’”汉代学者对“著”、“作”的义界表述得十分清楚。司马迁《史记》，创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和体例，成为正史中的开山之作。他在《史记》中，较多地使用“著”、“作”这两个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指明老子、韩非的文章是“著”。又《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作者自认为是“著”。又作“箸”。《刘敬叔孙通列传》：“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箸也。”可知司马迁理解的“著”与“作”，具有个人创造及创新的成分，属于学术开拓性的工作。

当然，对于《春秋》、《诗》是否属于“作”，是可以讨论的。《汉志》中《春秋》类小序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依班氏所载，《春秋》是有所本的，即来源于“右史”所记，孔子是整理者。有无“作”的内容？小序又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在整理中又隐含了自己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又包含了一些“作”的内容。

比司马迁稍早的淮南王刘安作《淮南子》，其《要略》中云：“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二十篇。”亦为创作之义。王逸《楚辞·招隐士》序中说：“《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这里用“作”、“著作”、“造”，都是创作之义。王充常用“造”或“作”。《论衡·案书篇》：“《新语》，陆贾所造。”《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

也。”又《对作篇》：“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于是始作《易》八卦”，“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作《说文解字》。”淮南王、淮南小山、仓颉、奚仲、伏羲、阳成子张、陆贾、扬雄、许慎之所作，皆有开创之功，所以称之为“作”、“造。”

可以知道，古代学者对于创造性的思维而形成的著作，是给以充分肯定的。这是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当今的科技、文化、思想的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这个观点，可以对《汉志》中有关著述进行一些分析。关于《周易》。小序云：“《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据此记载，《易》属伏羲氏的创作。又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孔子依据《易》的内容而为之解说，属于“述”的范围，不归于“著”。

二 撰述

述，《说文》：“循也。”即依循义。《字汇》：“撰，撰述也。”《正字通》：“撰，属辞记事曰撰。”朱熹《楚辞·招魂》注：“撰，述也。”文献学中的“撰述”，指的是整理。这种整理，含有加工、提炼的意义，实则是二次创作。对于“述”与“作”的关系，朱熹《论语集注》“述而不作”注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这里分析了“述”、“作”的区别，解释孔子为何自称是“述而不作”，表明了孔子治学的严谨和道德的高尚。孔子整理六经，其价值远远超过原